



## 穿过失落的田野与洪流

“因此，与其说这是一部乡村调查的话，毋宁说是一个归乡者对故乡的再次进入，不是一个启蒙者的眼光，而是重回生命之初，重新感受大地，感受那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与心灵。它是一种展示，而非判断或结论。困惑，犹疑，欣喜，伤感交织在一起，因为我看到，中国现代化转型以来，乡土中国在文化、情感、生活方式与心理结构方面的变化是一个巨大的矛盾存在，难以用简单的是非对错来衡量。——梁鸿”

创作《中国在梁庄》前，梁鸿曾任教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。她认为只有“与自己的心灵，与故乡，与那片土地，与最广阔的现实”紧密联系的生活，才能被称为“体现人本质意义的生活”。回乡，便成为一场精神上的“重新落地”——用身体去感受，用双脚去丈量，用心灵去触碰那个她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。

梁鸿在《中国在梁庄》前言中的自述，是理解这部非虚构文学的钥匙。这本书是她远走他乡多年后对故乡的回望与反思，是对故乡多年变迁的展示。然而，当我们真正走入文本，会发现在“展示”二字背后，是一场远比想象中更复杂的精神跋涉。这部由多篇采访稿与自述构成的纪实文学，记录的不仅是穰县梁庄的众生相，更是一个归乡者在“情感的故乡”与“理性的他乡”间艰难穿梭的精神轨迹。

**归乡者的凝望：在洪流中看见“人”**

《穰县县志》记载，近几十年来，梁庄的道路与住房发展迅速，

大规模的乡村基建似乎为乡村带去了振兴与走向现代的希望。然而，当梁鸿踏入故乡，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副景象：由于村民的大规模迁出，昔日住房成了大片的断壁残垣；为修建砖厂，厚重的土地被“平地掘三丈”；大大小小的坑塘，更被污染成了“黑色淤流”。这种撕裂感构成了观察的起点——她并不简单地将现代化责备为梁庄面目疮痍的自然环境的始作俑者，而是向更深处追问：为何同一个村庄，在官方记载与个体记忆之间，存在如此大的裂隙？

更耐人寻味的是村民的态度。他们并非完全是被动的受害者，而更像鲁迅笔下刻画的看客，将目光聚焦于个体抽象的“幸福”“富裕”，却浑然不知，或是不愿察觉，身旁日益恶化的环境也是他们生活的部分。有形的环境变迁与无形的集体沉默，共同构成了今日梁庄的复杂场景。

这种观察，从自然环境延伸到乡村的人文秩序。费孝通在《乡土中国》中指出，中国传统社会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。梁庄也并不例外。梁庄的老一辈仍爱以姓氏为区分畅谈家家事；宅基地的划分，也依据家族的远近、人口的多少来分配。“一个梁姓，既是一个宗族、血缘场域，也是一个生活、文化场域。”

然而，梁庄大规模的发展浪潮正在重塑这一切。传统的大家族文化正在衰退，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为中心的聚集地。传统的血缘亲情纽带逐渐淡漠，传统的大家庭被素不相识、仅由相似的经济实力而组成的地缘关系所取代。传统乡村文化网络支离破碎，导致乡村社会失序与文化认同迷茫。

但梁鸿的独特之处，不在于她发现了这类宏观的结构性变迁，而在于她始终凝望着这些变迁在具体的个体身上留下的痕迹。那些在重要节日匆匆见面的“团圆”，那些留守在颓败故乡的

## 山风润少年

将台中学八(2)班并非我带过成绩最好的班级，却是我上课最舒服的班——课堂纪律井然，教室窗明几净。这份舒心，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班里的领头羊，我的物理课代表白小军。

他是负责的课代表、靠谱的领头羊。在我的物理课上，他听课专注，从未走神犯困，提问时总是积极举手，清脆的回答让课堂节奏顺畅推进；他会悄悄提醒卡壳的同学，带着他们跟上进度，成了班级里的“定海神针”。他摸得清每位同学的学习情况，课后主动和我沟通，让我的因材施教更有方向。从收发作业到督促同学，他把每件小事都做得妥妥帖帖，用小小的肩膀扛起了属于自己的责任。

他也是偏科的“物理小天才”，偏得格外鲜明——物理成

绩在班级遥遥领先，其他科目却略显惨淡，这份反差让我又喜又惜。欢喜的是，我的课堂能被他如此喜爱，八年级才接触物理，他的天赋得以展现；惋惜的是，这般聪明的孩子，却在其他科目上迟迟找不到状态。

但我始终相信，他在物理学习中展现的认真与悟性，只要慢慢引导，终将化作攻克其他科目的力量，未来定能有所成就。

走出课堂，白小军是操场上活力满满的追风少年。篮球、羽毛球、排球场上，都有他挥洒汗水的笑容，满是少年意气。这个在球场上开朗的男孩，骨子里藏着腼腆与礼貌。入冬的那天，我给每位学生发了苹果，他大口地吃着，发现被抓拍的下一秒就害羞地笑了。

有天赋、有担当、有热爱，白

老人与孩子，那些既无法融入城市，又不愿退回乡村的青年——他们的迷惘、隐忍与挣扎，构成了远比任何理论概括更为复杂的生命图景。

梁鸿的书写之所以打动人，正是因为始终保有对人的理解与尊重。相较于站在高处审判，梁鸿更愿意回落到人的存在本身，让我们看到那些被遮蔽的细节。她记录下生命个体在乡村中的起伏，更用对具体生命的刻画与反思引发我们的回望。

梁鸿的笔触动人之处，在于她不回避人性的复杂，拒绝把人简单地归为善恶，更不愿将一切痛苦与无奈归结为过于宏观的结构性矛盾。她让我们看到，乡村生活中许多个体的痛苦，并非源于传统叙事里所说的天灾或人性本恶。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、被搁置的个体尊严，在沉默中不断积压。它们从未消失，只是潜伏着，直到某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现。

梁鸿对每一个具体的“人”的聚焦与书写，体现了她心目中的乡土关怀：愿意走进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，倾听每一个生命背后的故事。梁庄因此不再是遥远的、陌生的他者。我们也得以透过梁庄，对“人”的处境产生更深的共鸣。

### 在他乡与故乡的裂隙间

对故乡之人的聚焦与关怀，决定了《中国在梁庄》独特的言说方式——每一位受访者的表达都得到尊重，每一个村民都可以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己的故事。《中国在梁庄》的文本，由大量未经精心雕琢的采访稿组成。这些带着泥土气息、略显随意的乡音，构成了作品最坚实的底座。它们以强烈的口语感，使读者仿佛亲身进入梁庄的颓败院落、泥泞巷陌，为文本注入了生命。这种叙述策略，是对过度修饰的文艺腔的摒弃，是一种自觉的克制的表现



白小军(右一)在啃我发的苹果  
作者供图

小军就像将台堡的风，带着少年的清爽与韧劲，在学习与生活的路上一路向前。

刘超祥(未来信息创新学院2021级本科生)

### 光影书画



校训墙前的郁金香绽放了，复旦的春天好美。

廖恒(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3级博士生)

——通过让渡部分叙事权，采访者试图退居幕后，让事实自己说话，从而营造相对冷静、客观的叙事氛围，避免个人情感对事实的过度演绎。

然而，任何以文字为媒介的再现，都注定与绝对的真实隔着一层无法穿透的玻璃。

这种困境是双重的：其一，是视角的局限。她的观察必然受制于足迹所至、目光所及，她笔下的梁庄，终究只是由无数个碎片拼凑而成的、有限的梁庄。其二，或许是更隐蔽的也是更绝对性的，是记忆的滤镜。那个承载着她童年温情与美好的梁庄，不可避免地当下被破败、颓废的梁庄重叠在一起。

因此，书中的“梁庄”从来不是地理学或社会学上一个纯粹的客观存在，它最终只能是“梁鸿的梁庄”——一个被情感浸润、被个人视角剪裁，最后由文字缝合的梁庄。但多年的都市生活，已在她与梁庄间划下了一道隐形的鸿沟。

因此，《中国在梁庄》的力量，恰恰不在于它达到了超越同类书籍的“真实”，而在于它坦诚地展示了求索“真实”中无法避免的矛盾与痛苦。这本书最终站在“情感的故乡”与“理性的他乡”的那道裂隙之间，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乡村的微观样本，更在于它记录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，在回望来时路时，所经历的那场真诚而痛楚的精神搏斗。

### 书写后的回响：梁庄的“被看见”

《中国在梁庄》的最后一页翻过，但梁庄的故事却从未结束。梁鸿在后来的写作中反复提到一个意象：“长河式记录”——以梁庄为样本，做持续观察，“十年，二十年，三十年，直到我个人去世”，最终形成一部相对完整的“村庄志”，记录时代内部的种种变迁。

书写梁庄之前，无数中国村庄处于“被遗忘的状态”。他们是统计学中的数字，是政策文件中的“农村问题”，却很少以这样生动、鲜活的形式出现在大众视野。该书出版后，引起关于“乡村该何处

去”“故乡沦陷”“大国撤村”等问题的持续讨论。梁庄从“沉默的大多数”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一个可以被言说、被思考、被共情的文化符号。从此，“梁庄”进入了与费孝通的“江村”、梁漱溟的“邹平”并列的学术谱系，成为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坐标。这种“被看见”，本身就是一种尊严的回归。

而这种“被看见”，也在悄然改变着梁庄本身。

近十年来，梁庄出现了新的变化趋势：一些在外打工的中年人开始返乡，带着城市积累的经验与视野，回梁庄带孙子、开店铺、谋新路。梁鸿的堂弟梁安便是一例。他曾在北京干了多年装修，最终带着妻儿回到镇上开了一家装修公司。收入不错，既能抚养孩子，又免于思乡之痛。这是“出梁庄”后的“回梁庄”，完成了生命的循环。那些在城市拼搏多年的人，逐渐把梁庄视为最后的归宿——梁庄不再是最初的单向输出地，而成为了可以回归的地方。

更有意味的是，梁庄的真实地名“内黄县梁庄镇”开始出现在政府报告中。当地正在推进“出梁庄记”品牌建设，发展温棚蔬菜种植与苦瓜茶深加工，让梁庄特色农业对接全国市场。文学书写与现实发展形成了奇妙的对应，那个曾经在梁鸿笔下满是“黑色淤流”的梁庄，正尝试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。

梁庄未来如何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这段描写或许是梁庄未来的隐喻：古老的仪式没有消失，他们在时代变迁中得以传承；深厚的伦理血脉没有断裂，他们在新语境下被重新阐释；坚韧的生命没有枯萎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。梁庄的道路还很长，但至少它已经被看到、被记住、被爱着。

从梁庄到乡土中国，这个古老的文化与生命有机体，正经历着由死亡到重生的巨大蜕变。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像梁鸿一样，持续记录，在变与不变之间，寻找那些被遮蔽的光亮。

白天和(外国语言文学学院2025级本科生)